

赤道人忆旧

父亲坎坷的一生 (三)



1956年6月举家回国定居时摄于广州 (我因在黑龙江工作, 未及回家, 照片缺我, 前左1为随父亲回国的表弟杨俊协)

父亲随遇而安。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, 大哥和我、弟弟都是国家和军队干部、四弟中专即将毕业, 大妹也在北京读大学。子女有出息, 又能孝敬父母, 这是为人父母最感欣慰的事。每到星期六下午, 大哥都带着在市内读书的弟妹回家, 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。父亲农闲时常到广州探亲访友, 同回国定居的“坤甸人”一起喝茶聊天, 虽并不感到孤独寂寞。

1957年7月10日, 在举家回国定居的第二年, 我从部队回家探亲, 这是我离家8年后第一次回家。那天上午9点, 班车还没到站, 父亲和弟妹们已在那里翘首以待; 母亲在家里煮好汤圆, 等候我回来。吃过象征家人团圆的红糖汤圆后, 父亲兴致冲冲地叫人去生产队买荔枝。一会儿, 他刚认识的农友保叔和几位农民便送来一大箩糯米荔枝, 父亲用客家话同他们交谈, 气氛亲切热烈, 似是相

交多年的老朋友, 农友们都叫他黄伯。二天, 父亲又带我去广州看望亲戚朋友, 逛“南方大厦”、文德化公园, 在沙河饭店吃“炒粿条”。他精神矍铄, 心情愉悦, 国内生活虽较为艰苦, 他又不会讲广州话, 生活有很多不便之处。但他对回国后的起居生活还是满意的。

第二次回家探亲是1959年夏, 此时已是公社化的第二年, 全国正在大跃进。华侨农场的田园、耕牛、农具在“公社化”中全部归生产队所有, 原来吃国家粮的归侨要“自力更生, 粮食自给”, 原先的果园全部改种水田。父亲在屋前屋后种的荔枝快要结果的荔枝树也收归生产队(后留树下两棵)。连家里从国外带来的自行车、缝纫机都被生产队的食堂和缝纫组使用(1962年落实政策时退回家里)。父亲因年老体弱, 初被生产队安排当牛倌, 跟保叔一起放牧十

头水牛; 生产队大办食堂时, 又被派去食堂当采购员, 由于为人诚实厚道, 办事认真, 工人的信赖和敬重。

这次回家只见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 话也不多。谈起当今社会, 他满腹狐疑, 怨言颇多, 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某些做法颇为不满, 流露出离开农村的想法, 但归侨的居民户口已改为农村户口, 回城之路已断。父亲对我说, 当年回国的积蓄已用尽, 以后的生活要靠你们的接济。鸦有反哺之义, 羊有跪乳之恩, 孝敬父母, 不仅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, 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。

第三次回家探亲是1962年春节, 已见父亲身体非常虚弱, 人也显得苍老。由于三年困难时期, 生活艰苦, 物资匮乏, 吃“瓜菜代”、“双蒸饭”, 营养不良, 父亲得了水肿病和心脑血管等疾病。这次回家, 父亲向我诉述三年困难时期的困苦, 对比起居住在印尼的华人遭受的灾难, 他认为当年回国定居是正确的, 在印尼吃总比在印尼遭人欺凌、迫害、残杀要幸运得多。当时, 大妹桂珍已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

并留校当助教, 在中五当助读, 即将毕业; 几个小弟弟, 分别在市内的师范学校、中学和郊区的中、小学读书。他寄希望于子女的未来, 对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信心的。离别时, 父亲表达了他最大的愿望, 希望在农村读书的小弟妹, 能继续升读高中、大学, 将来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益之人,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他和母亲在农村即使挨一辈子苦也无悔无怨! 父亲对子女殷殷期盼之情, 令我感受到天下父母心的纯真、圣洁和伟大!

此后, 父亲身体越来越差, 经常到广州看病。但他每次来信都极少谈他自己的病情, 以免在外地的儿女牵肠挂肚。1964年5月中旬, 我接到大哥

的一封信, 说父亲因风寒感冒, 并发浮肿和心脑血管病, 住现在广州工人医院治疗。但他老人家对自己的病还是有信心的, 嘱咐我们不必远道来广州探望。不料, 一个星期后突然接到大哥的电报: “父亲于5月24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, 享年五十九岁”。噩耗传来, 悲伤至极, 我远在黑龙江边陲, 无法赶赴广州奔丧。

父亲一生坎坷, 为了养育我们, 含辛茹苦, 历经磨难, 不屈不挠, 在苦海逆境中挣扎奋斗了大半辈子; 回国定居后又遭遇困难艰辛的生活, 未曾受过子女涓滴之报, 便永远地离开我们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 奈何! (完)

作者: 黄新聪



图为日本投降后, 西加里曼丹华侨建于东万律机场附近“万人坑”的“抗日战争时期殉难同胞和烈士纪念碑”。二战期间, 惨遭日本飞机轰炸及日本占领军屠杀、活埋、劳役致死的华、印、荷各族人民达2.1万人, 其中华人、华侨超过5000人, 而当年西加里曼丹华人、华侨不过40多万人。血海深仇, 永世难忘。